

## 花言哨语

## 《好东西》实现的是我们对“新”和“轻”的渴望



## 钱眼识人

## 有“耻感”未必不好

上海电影节影帝黄晓明的新作《戴假发的人》经过非常短暂的“院线游”转为线上播放，它的口碑以及票房也提前触及到“天花板”。虽然我也是在平台上观看了它，但却觉得在黄晓明的作品体系里是不差的，甚至从角色戏份的角度来看是超过《风声》，体现了黄晓明强烈的创作欲望，我觉得“有严重耻感的中年男人”可能是他最有发挥空间的角色类型。在这部电影里，哪怕像小孩一样蜷曲铝制浴缸里，荷尔蒙感觉稀释到无，哪怕他有胡须拉碴的造型，也不会给人起雄的感觉。现实生活中的黄晓明是个霸总，如果在角色里孔雀开屏就显得油腻，而他只有在精神上完成对自己的“去雄化”，才有机会去接近角色更好的质感。在内娱，跟他差不多段位的男演员几乎没有人是这样。

电影最浅显的故事当然是类似《热搜》或者《嘉年华》，讲少女受害的案件调查，同类型的作品观众看得比较多，这个部分讲得也很平庸。但真正打动我的其实是电影的几个细节。第一个镜头是黄晓明角色受审的环境，不是传统的审讯室，而是在一个类似教堂的环境里，光线过曝，还有工人在高脚架上粉刷墙壁，这个环境代表了男主角的救赎，他犯了什么罪或者说罪人真的是他吗？然后就是他的书架上有父亲的遗像，旁边是俄罗斯名著《古拉格群岛》，“古拉格”在俄语的意思是劳动改造管理，代表着对知识精英的改造与管理。谁来改造？是不是时代环境？

少女受害不能算故事重点，重点就是讲一个本不该成为罪人的罪人如何去赎罪。导演董越蛮会搞这种“移花接木”，第一部作品《暴雪将至》的故事虽发生在南方，但是无论从影调还是氛围或者人物的状态，其实剑指“东北往事”，与“漫长的季节”同题作文并且早了六年。

电影名是《戴假发的人》，有了假发，秃顶的男人就有了尊严。这顶假发是一张文凭，是一个上岗的名额，一个父亲的体面，一个儿子的自信，不是你在戴就是我在戴，左手倒腾右手。电影中，有两种人不需要假发。一种是死去或者将死的底层人；还有一种人是成功人，一个是终于爬到律所金子塔尖的黄晓明，稀疏的头发证明了他的资深与权威，对比下来就是苦熬司考，开出租或者当工人时期，发量如鸡窝。然后当然就是收购地皮的大佬，发际线高高的，油头偏分。

董越在摄影方面是有一些想法的，结尾黄晓明以为自己杀了人开着车仓皇逃走，后尾灯是红色的，就像拖出一条血路，暗示了可怜人互害杀出血路才能跃升的残酷悲剧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开头富商阿猫阿狗的亲戚去殴打讨薪的农民工，为的不过是权贵门口一碗羹。现在最火的华语电影是《好东西》，片中有三个男性角色：小马、前夫哥和胡医生，搁在现实生活里都是高质量男性，虽然有价值观自学的压力，但整体来说都套上了“肯”的粉嫩滤镜。相比之下，黄晓明饰演的秃顶律师角色背负耻感而显得消极阴郁，但后者是不是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呢？值得商榷。



韩松落  
作家

常原秋  
媒体人

长风新  
媒体人

钱德勒  
媒体人

新人类”为帜，比如“花儿乐队”，比如王菲或者张浅潜。但三十年过去了，距离《漂一代》的话题被大张旗鼓地列出来，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，我们似乎还是没有真正地“新”起来，“漂”起来，更别说是“新新人类”，我们最紧迫的任务，已经不是如何应对“新人类”和“漂一代”，而是如何应对越来越保守的社会，越来越重的疲态。

《好东西》又一次把这个议题摆到了桌面上。《好东西》里，最重要的就是新规则，新关系，新可能。导演邵艺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“好东西”是这个故事的核心，这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。片名“好东西”与“history”反过来写就是“HerStory”（她的故事）。而在台词里，主人公也说，那些让你舒服的，愉悦的东西，就是好东西。什么样的东西，会让人愉悦呢？新规则，新关系，新可能。要想实现这一切，人首先得是新人类，新人类不存，新城市焉附？如果没有新人类和新关系、新可能、新未来，新城市就只有一个名头而已。

所以，《好东西》里，看不到老的旧的一切，没有家长，没有老关系，没有旧的规则，原生家庭只作为一个暗影出现，故事里的人，自然而然地生活在新关系里，故事里的人从事着新工作，新媒体主编，带货的主播，以及乐队主唱，乃至滴滴司机，租房的邻居成了好朋友，社交媒体上认识的人成了床搭子，小孩子也顺利融入成人世界，说着深沉的金句，不用为他们专门设置一套话语。不适应这种新关系的，则成了前夫

和前男友，被推出了这个由新人和新关系构成的世界。

新了，就轻了，就没有负重了，就像八十年代流行的一首歌所唱：“过去的事情不再想，弹起了吉他把歌儿唱”。历史的大包袱，既然无从放置，那就重新给出一个设定，一个场域，开始新的话语，轻装上路。

这种娱乐化，这种对轻盈的极度渴求，这种心态转换，不只发生在电影，有媒体研究组织认为，随着时代气氛变化，以及媒体态势的变化，媒体对重大社会议题的话语方式发生了变化，以前我们面对社会议题的话语，都趋向于严肃、正式，有固定的关注点，也有固定的解读方式，但新的时代，气门却趋向于轻，趋向于边缘信息，人们会在短视频和金句里，寻找狂欢的机会，人们对社会的关注没减轻，而观看途径、场景、关注点已经变了。

卡尔维诺说，面对灾难重重的生活，人们总希望“减轻了自己的体重，飞到另一个世界去，依靠另一种知觉去寻找战胜灾难的力量”。他最后得出结论：“在遭受痛苦与希望减轻痛苦这二者之间的联系，是人类学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常数”。我们生活在沉重之中，却渴望轻盈，《好东西》实现的正是我们对新的一切，轻盈的一切的渴望。

种各样家务的铁梅，是认真生活、独立思考的人们所亲近和熟悉的。

所以，何必细算算计铁梅、小叶租住的老房子需要多少租金，又何必反复思考，把“见过贾樟柯”写进作文，是不是一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。那些对《好东西》认真又严肃的分析指摘，大概依然是“老东西”式的先入为主，仿佛论证了这些“远离生活”的细节，就能说明电影里的美好是轻佻的、悬浮的。

但或许，电影并不总要挑起什么、教育什么、端正什么，也可以只是一种正在发生的当下，一种持续向往的未来。《好东西》里那些温和、坦然、有回味的表达，已然足以在更长的周期里，抚慰并鼓励人们，向内追寻，向外生长。

从从容地叫人心喜欢。更重要的，是整个故事没有滔滔不绝的表达欲，只是轻盈地、坦然地把她们自己的生活摊开来说，理解又包容。

没有谁规定单亲妈妈必须怎么样，看起来无所不能的铁梅，也有猝不及防的崩溃时刻；也没有谁批评小叶的“恋爱脑”，怒其不争之后依然可以给予一个理解的拥抱；更没有谁摁着茉莉走一条正确又明亮的道路，允许她当鼓手，也允许她平和地当观众。即便是造作又软弱的前夫哥、自私又精致的小胡，电影也有漫不经心的平和：该吐槽的吐槽，该一笑而过的，就让他们去吧。

我不否认《好东西》精准地击中了一部分人的喜好，但这并不影响它拥有真诚的灵动。电影里那些动人的细节，并不需要住在老洋房，或是熟读上野千鹤子才能懂得。在地铁上把肩膀借给铁梅的女乘客，在家里种满了蔬菜、圆满了食物的小叶，还有在阳光下熟练利落地完成各

## 像蜗牛一样永不回头

录》。这是一部相当催泪的动画，原因无他，一对孪生兄妹孤儿分隔两地，都是浮世畸零人，命运由不得自己做主，为了那个团聚的渺小愿望，努力靠近，费劲力气。这样的故事设定相当极端，以致电影基调抑郁，一开始极易让人随人物坠入悲苦怨愁的深渊，但是随着剧情推进，调子缓慢上扬，直至迎来最终的团圆。

这样的动画不能二刷。并不是说动画不好，而是跟随人物经历一次噩梦足矣。不少观众诟病人物造型过于粗犷，这由影片美学风格决定，可以说是调皮的恶趣味，也可说是别有深意。反派人物穷凶极恶尚可理解，女主人公也形同蜗牛，就像一个墩子，平平无奇，说明讲的是平凡人的故事，尤其在阴郁沉重的内外环境里成长，难免相由心生。片中最后出现的遗书里，形容生活应该是一幅美丽的挂毯，说明这是尚未实现的美好愿景，所以那些人物，难免臃肿、扭曲、凹凸不平。另外，粘土动画是一种稀缺的纯手工活，前期无法依赖今天的各样利器：电脑、AI等等，相比流水线上生产的芭比娃娃，捏泥人越是粗拙，越有独特意趣。

在影片里，女主人公甚至还有蜗牛收集癖，

## 早闻秋声

## 《好东西》：正在发生，持续向往

带妈妈和外婆去看《好东西》，收获了她们的一致好评。

在此之前，许多评论都说，这是一线城市的“小资”才会偏爱的电影。但在电影院里，两个老阿姨常常会心一笑：从铁梅骑着平衡车赶走尾随小叶的陌生男子，到小叶和小孩王茉莉一起感受不同的声音，再到“前夫哥”和鼓手之间微妙又尴尬的气氛……

她们没有刷过电影预热的宣传视频，没有被剧透过那些高光金句，甚至未必能看懂电影最后铁梅、小叶和茉莉 cosplay 的隐喻。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她们纯粹欣赏，直到散场，依然留有回味地讨论：表演不错，剧本挺好，足够真实。

这同样是我喜欢《好东西》的原因。宋佳一如既往，稳定发挥，与《山花烂漫时》分明就是两个人；钟楚曦不再是美艳的符号，灵动俏皮，有意外之喜；而小孩曾慕梅叫人眼前一亮，从

## 情人看剑

很难想象，粘土定格动画里的人物，怎样让它们时时泪水涟涟。是在拍摄暂停时，就像给没法流泪的演员那样滴眼药水，还是在粘土里埋下一些类似细管的机关，一到关键情节，向上输送水分？观看动画电影《蜗牛回忆录》时，时时会有这种疑问。因为故事人物情绪饱满，有很多场哭戏，货真价实的泪水，粒粒可见，甚至可以夺眶而出，滑落腮边。冰冷的粘土，晶莹的泪滴，本身是相当违和的两种物质，别的液体还可以作假，甚至包括鲜血、烈酒、番茄酱、蜗牛黏液，唯独到了眼泪，必须以诚相待。

十五年后，《玛丽和马克思》的导演亚当·艾略特终于拍了第二部动画长片《蜗牛回忆

上海文艺评论  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